

## 作者簡介

李逸津，男，1948年10月出生於天津市，1973年畢業於天津師範學院（現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直至2011年退休。曾任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國際中國文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於1988～1989年、1999～2000年兩度受國家公派，到俄羅斯列寧格勒國立赫爾岑師範學院、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做訪問學者。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中國古代文論、中俄文學關係研究論文80餘篇，70餘萬字。出版個人及合作學術專著7部，主編古代文論和美學教材兩部。

## 提 要

本書為作者自2009年以來，參與多個國家或省部級社會科學重點研究項目而撰寫的論文匯編。各篇所論，基本圍繞20世紀中國與俄羅斯（包括蘇聯時期）之間文學交流這個中心。內分「文化外播」「文論吸納」「個案分析」三編，分別介紹俄羅斯漢學關注中國民俗文學與文化的傳統，並通過譯介中國古代志怪傳奇、「三言二拍」、《聊齋誌異》等通俗小說對中國民俗文化的接受與闡釋；中國自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尤其是1949年之後對俄蘇文論的吸收引進和本土化改造；當代俄羅斯著名漢學家宏觀論述中國文學史寫作和中國現代文學在俄蘇的研究情況，以及對《文心雕龍》《金瓶梅》《紅樓夢》等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學理論經典著作的專題研究史。所有論文皆建立在實證材料的基礎上，舉證翔實，史論結合，對所述材料不是簡單羅列，而是皆有作者個人的議論和點評，具有一定的民俗學、文藝學、文學史研究乃至翻譯闡釋學方面的理論價值。文中所引俄文資料，大多由作者直接根據原文譯出，其中有些材料係首次向中文讀者披露，故亦有一定的資料價值。讀者可從中瞭解20世紀俄羅斯漢學—文學研究的發展概況，中國文學與文化在俄羅斯的傳播，以及中國特色現代文藝理論體系對俄蘇文論選擇性吸納的歷程。

# 我與中俄文學關係研究

## (代序)

眼下「海外漢學」熱悄然興起，不僅許多外語專業人士以此為新的學術發展方向，中文、歷史，甚至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專業的學者，也有不少人躋身海外漢學研究。國內許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也紛紛成立「海外漢學」或「國際中國學」等研究機構，召開了不少這方面的學術會議，國家也批准了一系列與這一領域研究有關的科研立項。作為一個自上世紀 90 年代初就涉足中俄文學關係研究的參與者，看到自己為之努力的學術領域有了新的同志，有了被社會認可和呼應的學術潮流，自然是十分欣喜。不過，我始終不認為自己是在研究俄羅斯漢學。因為在我看來，海外漢學是一個十分寬廣的學術領域，不僅是文學，還有哲學、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軍事、宗教等等，所有一切外國人研究中國這些領域問題的學術，都屬於「海外漢學」的範疇。而我所做的工作，不過是研究俄羅斯如何引進介紹和研究中國文學的情況，所以我總說自己從事的是「中俄文學關係」研究。

說起我進入這個學術領域，實在是很偶然，甚至帶有被動、「誤闖」的成分。上世紀 80 年代末，長期緊張的中蘇關係出現解凍，蘇聯方面自 1985 年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後，推出一系列旨在改善中蘇關係的舉措，其中包括雙方互派 600 名高等學校教師進行學術交流。我自己早在 60 年代上小學時就學過俄語，以後從初中到高一「文革」開始之前，又學了 4 年俄語。70 年代末報考研究生，為了應付外語考試，駕輕就熟還是選擇了俄語。研究生學習期間，作為研究生公共外語課程，又跟專業老師學了一年俄語。以後考慮到評職稱還要考外語，又參加了學校為青年教師晉升職稱組織的俄語輔導

班。自己還訂閱過一些俄語普及讀物，甚至買過一些俄文原著練習翻譯。有了這些積累和儲備，當學校通知各系選拔赴蘇訪學教師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就報了名，並且通過了學校內部的初選。然後就是到北京參加出國人員外語水平測試（BFT）。1987年春天第一次考試沒過，但瞭解了考試門路。到秋天再考，得了84分，超出非專業人員及格線2分，被批准參加國家教委委託上海外國語大學主辦的出國外語強化培訓班。這樣1988年上半年到上海培訓，考試合格，下半年就被派到蘇聯列寧格勒國立赫爾岑師範學院（現名俄羅斯國立赫爾岑師範大學）去做「訪問學者」（俄文名稱叫「進修生」——стажёр）。

我自己是中文系教師，在學校裏教文藝理論和古代文論，到俄羅斯學什麼？學中國古代文論？那真成了錢鍾書先生在《圍城》裏諷刺的「學國文的人出洋『深造』聽來有些滑稽」了，所以我只能選新中國建國之初從蘇聯引進的「文藝理論」。想到當時國內正在反思長期影響我國文藝理論教學和文藝路線政策的蘇聯文論體系，研究如何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到這套理論的源頭去做追根溯源的探尋，實地考察其課堂教學與文藝工作實踐，與教師、學者和文藝工作者直接對話，瞭解其現實發展與爭議質疑，自認為是很實際，也是很急需的吧？於是我就在填報進修選題時寫了「蘇聯高等學校文藝理論教學現狀評估」。此時我還根本沒想到研究什麼「蘇聯漢學」。

還是到臨出發的前一天，我到系裏去跟領導、同事們道別，在樓門前遇到古漢語教研室的隋文昭老師。隋老師問我去蘇聯的事，同時提醒我說：「列寧格勒可是蘇聯重要的漢學研究基地，你到那裡應該考察一下他們漢學資料收藏和最新的研究狀況。」這話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可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這時我才在自己的進修計劃裏加上了考察蘇聯漢學的內容。

到達列寧格勒赫爾岑師範學院語文系之後，系裏指派葉甫蓋尼·阿列克謝耶維奇·卡斯丘辛副教授做我的學術導師。別看他副教授，但擁有正博士學位，這在當時的蘇聯高校非常難得，所以課程表上他的名字前頭，標有兩個俄文字母「Д」（Доктор 博士加 Доцент 副教授）。導師不懂中文，派他做我的導師，一是因為當時赫爾岑師院語文系裏只有他一個人在教文藝理論，同時也因為他出生在哈薩克斯坦，其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中亞民間動物故事和傳說，用當時系秘書小姐的話來說：「算是和你們中國沾點邊吧！」導師早年

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是蘇聯著名文學理論家、波斯彼洛夫學派創始人 Г. Н. 波斯彼洛夫（1899～1992）〔註 1〕教授的學生。在這樣一位導師指導下研究蘇聯文學理論問題，自然十分榮幸。但我還是想試著貼近自己在國內原來的研究方向，以便揚長避短，易出成果。與導師接觸不久，我就提出想寫一篇介紹中國古代文論的論文，將來就算作我的進修總結報告。導師很爽快地答應了，並親自幫我修改。這樣我就寫出了平生第一篇俄文論文《什麼是「氣」——論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一個概念》（Что такое Ци? — Об одном из понятии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те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這也算是我在中俄文學交流研究方面的處女作吧。

赫爾岑師院裏沒有東方學科，也沒有懂漢語的人和漢籍藏書，所以在這裡根本談不上考察什麼「蘇聯漢學」。幸好我在中國駐列寧格勒總領館組織的出國留學人員集會上，認識了當時在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教漢語的來自北京語言學院的劉鐮力（原名劉蓮麗，文革時改的這樣一個革命化名字）老師。劉老師是 60 年代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又和我當時所在系黨總支書記的愛人是同班同學，找到了幾個共同點，這就一下子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劉老師是個熱心人，當即向我提供了幾位列大東方系漢學家的名單。經她介紹，我得以拜訪和諮詢了著名漢語翻譯家尼古拉·斯別什涅夫（漢名司格林，1931～2011）〔註 2〕，著名中國古典文學和戲曲研究專家列夫·緬尼什科夫（漢名孟列夫，1926～2005）〔註 3〕，古漢語研究專家謝爾蓋·雅洪托夫（1926～2018）〔註 4〕等老一代學者，還有當時在東方系讀研究生並兼任教學秘書的一位記不清是叫「維拉」還是「列娜」的小姐。這位小姐當時正跟司格林教授攻讀中國當代文學，她向我介紹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在蘇聯翻譯和

〔註 1〕 根納季·尼古拉耶維奇·波斯彼洛夫（Геннад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спелов，1899～1992），蘇聯著名文藝學家、文學理論家，自 1960 年至 1977 年任莫斯科大學文學理論教研室主任。其所提出的「藝術的意識形態本性」理論，對我國新時期之初關於藝術本質的大討論產生過較大影響。

〔註 2〕 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斯別什涅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пешнев），出生於北京，在中國生活到 16 歲，是俄羅斯漢學界著名的中國通。生前為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榮譽教授，俄羅斯聯邦高等學校功勳工作者。

〔註 3〕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緬尼什科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現代蘇聯新漢學奠基人 В. М. 阿列克謝耶夫的學生，東方學家、漢學家，翻譯家，自 1955 年起任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研究員。

〔註 4〕 謝爾蓋·葉甫蓋尼耶維奇·雅洪托夫（Сергей Евгеньевич Яхонтов），列寧格勒國立大學東方系副教授，漢學家，歷史比較和普通語言學家。

研究的情況，還幫我複印了一批從圖書館借來的中國新時期文學作品的俄譯本。當時正值戈爾巴喬夫計劃訪華，蘇聯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中國文學熱」，許多中國新時期文學作品在蘇聯被翻譯介紹。這使當時與中國隔閡 20 多年、並對中國改革開放抱有極大新鮮感的蘇聯讀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記得當時在列寧格勒涅瓦大街書店裏出售新版《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овелла Китая）〔註 5〕的時候，我也是擠在排隊大軍中才搶到了一本。這種盛況，今天是看不到了。

就這樣，我在列寧格勒零零散散地搜集了一些俄譯中國文學方面的資料，當時也沒想到要幹什麼，回國後有什麼用。不成想，我 1989 年 8 月底回國，本系王曉平老師找到我，說他和當時任中文系主任的夏康達教授領銜，申報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 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已經把我列入課題組成員名單。過不多久，他又找到我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周發祥先生約他申報的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古典文學在世界」也獲批准，但原定參加項目的社科院一位懂俄語的研究員因病退出，請我也參與這項工作。這樣，我一下子介入了兩個國家級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工作，壓力實在是不小。現在想來，也是我自己無知膽大，充滿自信，遇事不怵頭、不怯陣的性格使然，當時竟一口答應下來。曉平老師雖只比我大一歲，差不多算是同年，但他學業精進，科研起步很早，到我倆 1987 年一起去北京參加出國人員外語選拔考試的時候，他已經出版了一部專著《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註 6〕，評上了副教授職稱。這在今天年輕一代博士、教授們看來可能不算什麼，但在我們當年卻是了不起的成績。此時他正要去日本訪學，自然又能深入庫藏，淘到不少資料。而我已從蘇聯回來，當時匆匆帶來的那點資料肯定不夠，面對如此龐大的科研計劃，真是一頭霧水，確實感到了「書到用時方恨少」啊！

怎麼辦？只能再去北京國家圖書館淘材料了。曉平兄爲了幫我完成任務，借給我一本北京大學李明濱先生贈予他的《中國文學在俄蘇》〔註 7〕，這是我見到的介紹中國文學北播俄羅斯最早的一部著作，當時可以說就是我的學術路線圖和指南針。按照李先生著作的指引，我到北京國家圖書館複印了

---

〔註 5〕 C·霍赫洛娃主編：《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овелла Китая），集體翻譯，莫斯科：藝術文學出版社，1988 年出版。

〔註 6〕 王曉平著：《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年出版。

〔註 7〕 李明濱著：《中國文學在俄蘇》，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 年出版。

第一批資料，有現代蘇聯新漢學的奠基作、В. М. 阿列克謝耶夫的《中國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詩品〉》（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彼得格勒：А. Ф. 德列斯列爾印刷所，1916年出版），И. С. 李謝維奇的《古代與中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思想》（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ысль Китая на рубеже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их веков，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К. И. 戈雷金娜的《19至20世紀初中國的美文學理論》（Теория изящн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в Китае XIX-начала XX в.，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1年出版）等等，此外還複印了蘇聯自1970年以後歷年出版、在國圖有館藏的《遠東文學研究的理論問題》、《中國：社會與國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裏有關中國文學的一些重要文章。當時我的指導思想就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因為我們未來要寫的「中國文學在俄羅斯的傳播與研究」，內容實在是包羅萬象，古典、現代，詩、詞、歌、賦，小說、戲劇，神話傳說、散文、筆記，只要在俄羅斯有翻譯和研究，就都是我要搜羅的文獻。那時我40歲出頭，正值壯年，在系裏也算是中青年骨幹教師，教學工作繁重，只能利用每年春節剛過，正月初五到十五這段寒假還沒過完，北京相對清靜的時間，到北京國家圖書館招待所住下，慢慢翻看、複印需要的資料。早上進圖書館翻卡片櫃，填索書單，交借閱臺。拿到書以後，翻閱查找自己需要的部分，再送複印室複印。當時圖書館規定一次只能借五本書，取書、複印都需要等待，所以一整天下來，最多能取還兩次，看到十本書。有時不順利，借出來的書不適用，或是想要的書籍庫裏找不到，還看不了這麼多。忙活一整天，最後在暮色蒼茫中拖著疲憊的身軀，捧著一大摞複印材料離去。

這樣的日子，大約持續了四、五年。那時研究中俄文學關係的人還不多，經常是我到國圖再度索取去年看過的某本書時，該書借閱卡上記錄的還只有我的名字，中間再沒有別人看過。估計裏邊書庫工作人員看借閱卡，就能知道去年那個人又來了。資料到手，真正的重頭戲還在後頭。我是非俄語專業出身，平時作為公共外語和出國前突擊培訓學的那點兒俄語，只能應付一般生活交際，用來讀專業性很強的文學研究著作，那真是杯水車薪，不敷一用。沒辦法，只能借助詞典硬啃。從1990年開始動手翻譯資料，到1998年第一批書稿交出版社，我前後翻爛了兩本厚厚的《大俄漢辭典》。有些老一代俄羅斯漢學家的著作，用的還是舊俄文字母，需要對照新舊俄文字母表去辨認；遇到措辭艱深冷僻的著作，甚至需要一個詞一個詞地查字典。而自己

當時做講師已過五年，晉升高級職稱迫在眉睫，像這樣慢吞吞的工作節奏，出成果要等到何時？形勢逼得我不能等集體項目全部完成，必須先打短平快，湊夠一篇文章的材料就及時成文，及時發表。我自己讀研究生時學的是古代文論，而俄羅斯漢學家研究這方面內容的著作，當時國內翻譯介紹的還不多，即便介紹也比較簡略。像李明濱先生《中國文學在俄蘇》一書中對阿列克謝耶夫司空圖《詩品》研究的介紹，就是如此。於是我決定以此為突破口，先翻譯評論這方面的著作。經過三年多的奮鬥，我在1994年《天津師大學報》第2期上發表了我在俄蘇漢學——文學研究領域的第一篇論文《〈文心雕龍〉在俄羅斯》，同年9月在《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第2、3期合刊上，發表了《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在俄羅斯》，次年在《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上，發表了《俄羅斯漢學家對〈文賦〉的接受與闡釋》。這一年還在《河北師院學報》第1期上，發表了《前蘇聯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述評》。這幾篇文章的發表，使我得以晉升為副教授，也從此奠定了我後半生學術生涯的基本走向。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當時發表的那幾篇文章，實在十分淺薄，基本上可以說是翻譯材料的堆積。其中唯一可以自我肯定的，是我憑自己以前所學中國古代文論方面的知識積累，對俄蘇漢學家翻譯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著作，作了一定程度的文本分析和點評。這在當時純俄文專業出身學者的著作中尚不多見。以後到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纂的《中國文學年鑒（1995～1996）》，全文收錄了我撰寫的《中國古典文論在俄蘇》〔註8〕；我為合作專著《國外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撰寫的「司空圖〈詩品〉研究舉要」一節〔註9〕，被俄羅斯著名漢學家李福清院士錄入其為2008年再版的B. M. 阿列克謝耶夫《中國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詩品〉》一書編寫的《現代司空圖作品研究文獻目錄》〔註10〕。進入21世紀，一些研究中俄文學交流的碩士、博士論文和專著中，也有人引用我當年對阿列克謝耶夫《詩品》研究所作的

---

〔註8〕《中國文學年鑒（1995～1996）》，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639頁。

〔註9〕王曉平、周發祥、李逸津著：《國外中國古典文論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370頁。

〔註10〕B. M. Алексеев: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 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 Москва: изд.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8.с.677.

B. M. 阿列克謝耶夫：《中國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詩品〉》，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學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677頁。

翻譯和評論，說明我對這門學術的發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當年的辛勞沒有白費，這是最為欣慰的。

1999年，我獲批國家教育部公派訪問學者，第二次來到蘇聯解體後恢復舊名聖彼得堡的列寧格勒，進聖彼得堡國立大學語文系進修。這時我已經在國內與學界友人合作，出版了《國外中國古典文論研究》、《國外中國古典戲曲研究》〔註11〕和《二十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註12〕三本專著，再到俄國，面對俄羅斯漢學家們，有了一些可作自我展示和平等對話的資本了。當時我提出想改派到東方系，但中國駐聖彼得堡總領館教育領事王英老師對我說：「你是中文系副教授，到他們東方系進修什麼？給他們講課還差不多，還是別改了吧？」於是維持原計劃到了語文系。

這次出發前，經過數年學術合作已經建立起深厚友誼的周發祥先生特意從北京給我打來電話，他此時擔任社科院文學所比較文學研究室主任，囑咐我多搜集一些俄羅斯比較文學研究方面的最新情況，所以我去語文系也算重任在肩，不是「打醬油」瞎混。

到了聖彼得堡大學語文系，我才知道俄羅斯大學裏並沒有「比較文學」這門課程，他們的叫法是「比較文藝學」（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或「歷史比較文藝學」（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其內容被定義為研究各民族文學之間的相互聯繫，以及不同國家文學的相似性與區別性，屬於文學史的一部分，因此劃歸文學史教研室。而俄羅斯這門學術分支的創始人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維謝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еселовский，1838～1905）恰恰是沙皇時代聖彼得堡大學的功勳教授，他的代表作《歷史詩學》（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現在已經被譯成中文，由我們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我到聖彼得堡大學語文系來，還真算拜對了山門。語文系指派給我的學術導師是俄羅斯文學史教研室主任奧斯柯里德·鮑里索維奇·穆拉托夫教授（Аскольд Борисович Мурагов，1937～2005），這位老先生是俄國傑出的文藝學家，專攻19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但讓他來指導我這個憑「半弔子」俄語來到俄國，而且並非研究俄羅斯文學的進修生，實在也是大材小用。老先生借給我兩本1926年列寧格勒出版的介紹

〔註11〕 孫歌、陳燕谷、李逸津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註12〕 夏康達、王曉平主編，本人撰寫俄蘇部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維謝洛夫斯基生平事蹟和學術思想的小冊子，以後就很難找到他了。看著手裏這兩本書脊磨損、紙頁薰黃的小書，估計其文物價值大於文獻價值，我實在有些誠惶誠恐，小心翼翼，生怕弄丟或弄爛。據同來的中國俄語界人士說，國內早有翻譯介紹維謝洛夫斯基學說的著作發表，不必在俄國啃這種老古董，於是我匆匆摘譯了一半左右，就把它們完璧奉還給穆教授了。

我心中實際的興奮點，還是在俄羅斯漢學——文學研究。這次很幸運地結識了此時正在東方系司格林先生門下讀研究生的華僑學者韓丹星女士。其實我與她應該說早就認識，1989年我第一次在赫爾岑師院進修時就見過她。她當時是國內東北師大地理系教師，帶著6歲的女兒來列寧格勒看她的俄國姨媽。那時和我在一起的有東北師大俄語系的于延春老師，與韓丹星的媽媽是同事，他倆在食堂裏見面說話，我在一旁聽著，但她可能不記得我。後來我第二次來俄羅斯之前，也是第一次出國結識的老朋友、清華大學的李剛軍老師給我來信，說有個中國研究生需要買平凹研究方面的資料，我便複印了一些有關文章給他寄去了。到了彼得堡之後我才知道，我所寄材料給的就是這位韓丹星。這樣，我倆以文結緣，也就成了朋友。經韓老師牽線搭橋，我得以認識了當時擔任東方系中國語文教研室主任的E. A. 謝列布里亞科夫（註13）教授，並參加了東方系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又經謝教授介紹，認識了當時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彼得堡分所工作的瑪麗娜·克拉夫左娃（漢名瑪麗）（註14），再以後又通過他們的輾轉介紹，以及我天津師大中文系過去的學生、現在莫斯科攻讀碩士學位的古紅雲女士的幫助，結識和拜訪了E. A. 托爾奇諾夫（漢名陶奇夫）（註15）、

〔註13〕葉甫蓋尼·亞歷山大洛維奇·謝列布里亞科夫（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ребряков，1928～2013），生於列寧格勒。1950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1954年以論文《中國偉大詩人杜甫的愛國主義與人民性》獲語文學副博士學位。1973年以論文《陸游的生平與創作》獲博士學位。1950年後在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任教，長期擔任中國語文教研室主任。

〔註14〕瑪麗娜·葉甫蓋尼耶夫娜·克拉夫左娃（Марина Евгеньевна Кравцова，1953～），出生於列寧格勒。1975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自1975年至2003年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工作。1983年以論文《沈約的詩歌創作》獲語文學副博士學位。1994年獲語文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中國傳統詩歌藝術美學經典的形成》。2003年9月調入聖彼得堡大學哲學系東方哲學與文化教研室任教授，2004年9月起為該教研室主任。

〔註15〕葉甫蓋尼·阿列克謝耶維奇·托爾奇諾夫（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Торчинов，1956～2003），蘇聯—俄羅斯宗教學家、漢學家、佛學家、中國哲學與文化史

譚傲霜〔註16〕、A. M. 卡拉別契揚茨（漢名高辟天）〔註17〕、Г. А. 特卡琴科〔註18〕等知名漢學家，從他們那裡獲得了許多關於當代俄羅斯漢學——文學研究情況的最新信息。

這一年在聖彼得堡大學我還結識了同住在瓦西里島謝甫琴科街 25 號聖彼得堡大學研究生和外國留學生宿舍樓的 A. A. 羅季奧諾夫（漢名羅流沙）〔註19〕和他的妻子 O. П. 羅季奧諾娃（漢名羅玉蘭）〔註20〕，他倆當時還都在讀研究生。這是一對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友好感情的小夫妻，我們之間

---

家。1994 年獲哲學博士學位，聖彼得堡大學哲學系教授，聖彼得堡佛館佛學講師及名譽主席。《宗教學》雜誌編委會成員。

〔註16〕譚傲霜（1931~2017），具有中國血統的俄羅斯漢學家，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95 年獲語文學博士學位，2000 年 10 月起任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教授。在漢語研究、漢語教學及教材編寫方面成績卓著，為俄羅斯漢語教學和漢語推廣做出了重大貢獻。

〔註17〕阿爾傑米·米哈伊洛維奇·卡拉別契揚茨（Артеми́й Михаи́лович Карапетья́нц，1943~），生於莫斯科，譚傲霜的丈夫。蘇聯—俄羅斯中國語文學家、版本學家和中國哲學史家。自 1966 年起為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教師。

〔註18〕葛里高利·亞歷山大洛維奇·特卡琴科（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каченко，1947~2000），出生於莫斯科，1965 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東方語言學院（現為亞非學院）中國語文教研室學習。1970 年大學畢業後到軍隊服役。1972~1974 年在政治新聞通訊社（АПН）遠東總編室工作。1974~1976 年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工作。1982 年以論文《作為文學文獻的〈呂氏春秋〉》獲莫斯科大學語文系副博士學位。1984 年回到東方學研究所，從 1991 年起成為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東方哲學部研究員。自 1995 年起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РГГУ）東方語言教研室主任，並在 1996~1999 年間兼任人文大學歷史與文化人類學所長。

〔註19〕阿列克賽·阿納托里耶維奇·羅季奧諾夫（Алекс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Родио́нов，1975~），出生于布拉格維申斯克，1992~1997 年在布拉格維申斯克師範大學漢語教學專業學習。1998~2001 年在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研究生班學習，師從俄羅斯當代著名漢學家、漢語翻譯家尼古拉·斯別什涅夫（司格林）教授。2001 年以論文《老舍與中國 20 世紀文學中的國民性問題》獲語文學副博士學位。現任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系副教授、系常務副主任，聖彼得堡俄中友協副主席，歐洲漢學協會副理事長，俄中兩國互譯 50 部文學作品工作小組成員。

〔註20〕阿克薩娜·彼得羅夫娜·羅季奧諾娃（Оксана Петро́вна Родио́нова，1976~），出生于布拉格維申斯克。1993~1998 年在布拉格維申斯克國立師範大學外語系學習，主修漢語、英語和中文翻譯。1999~2003 年在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做研究生，師從俄羅斯當代著名漢學家 В. Ф. 索羅金教授。2003 年以論文《當代中國作家張賢亮的創作》獲語文學副博士學位。現任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漢語教研室副教授。

建立起如俄國人所說的「互相幫助」（俄語：помог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的合作關係。我向他們請教俄文方面的問題，他們向我諮詢中國文學。流沙的研究題目是老舍，玉蘭研究張賢亮。我們之間的這種忘年交友誼一直延續到今天。現在他倆已經是在俄羅斯漢學界享有一定名氣，並且在工作崗位上挑大樑的中年學者了，他們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許多具體的幫助。

除了向俄羅斯漢學家當面諮詢和請教，搜集俄羅斯漢學——文學研究資料最基本的途徑當然還是購買圖書和複印資料。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所在的大學河岸街 11 號樓一層半地下室的書店，以及大學主校區北面不遠的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院圖書館，就成了我經常光顧的地方。在我進修的那一年裏，幾乎書店裏所有新上架的中國文學翻譯和研究方面的著作，都被我盡數收入囊中。此外，位於涅瓦大街、鑄造廠大街和瓦西里島上的幾處舊書店，也成了我淘書的好地方。要知道，在俄羅斯買舊書有時比新書還貴，並且俄國政府規定 40 年代以前出版的舊書算文物，不許出境，買書的時候還要看好年代。我在這些地方買到的一些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好書，如 К. И. 戈雷金娜的《太極——中國 1~13 世紀文學與藝術中的世界圖畫》（Великий предел: кита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мир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культуре I - XIII вв. 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95 年出版）、И. Г. 巴蘭諾夫的《中國人的信仰和習慣》（Верования и обычаи китайцев, 莫斯科：螞蟻出版社，1999 年出版）、В. А. 魯賓的《古代中國的個性與政權》（Личность и власть в древнем Китае, 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學出版中心，1999 年出版）、С. А. 謝洛娃的〔註 21〕《俄羅斯白銀時代戲劇文化與東方藝術傳統（中國、日本、印度）》（Театр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серебрянного века в России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традиции Востока: Китай. Япония. Индия, 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1999 年出版）等等，尤其那本在舊書店裏淘到的《中國色情》（Китайский эрос, 莫斯科：正方出版聯合體，1993 年出版），回國後從中取材，助我寫成了好幾篇得以在核心期刊發表的重要文章。直到最近，《重慶三峽學院學報》發表我的一篇《俄譯中國古代豔情小說中的性民俗與性文化解讀》，許多材料還是取自那本《中國色

---

〔註 21〕 斯維特蘭娜·安德烈耶夫娜·謝洛娃（Светлана Андреевна Серова，漢名謝雪蘭，1933~），出生於莫斯科。其父二戰時在蘇軍總政治部工作，參加過解放中國的戰鬥，並且跟中國人學習過漢語。受父親影響，她 1951 年中學畢業後即入東方學院學習漢語，1957 年畢業。後又進國際關係學院學習，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情》。一年出國搜集的資料，讓我用了十多年，甚至國內某知名作家在舉辦中俄文化論壇展覽時，還借用過我收藏的俄譯漢籍作為展品。直至我退休之後，仍有學界朋友邀我參與國家級重點科研項目，每年還能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兩三篇論文，用我的一位當過出版社編輯的同事的話來說，這叫「抓住了活魚」，充分說明了在學術研究中佔有第一手資料的重要。

2000 年秋天回國後，我申報並主持了天津市「十五」社科規劃項目「20 世紀俄羅斯漢學——文學研究」，並承蒙天津師範大學和文學院領導的支持，成立了由我任所長的「天津師範大學當代俄羅斯漢學研究所」，組織本校學術力量，有計劃地開展對當代俄羅斯漢學的研究工作。以後我這個所又與王曉平教授主持的「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合併，於 2009 年成立了天津師範大學國際中國文學研究中心，承擔了國家級重大社科項目「20 世紀中外文學學術交流史」的研究。有團隊的協作，有項目的規劃，使我的工作更有目標，也更有動力。自 2009 年之後，我在 8 年時間裏在國內外學術刊物和學術討論會上累計發表了俄羅斯漢學——文學方面的研究論文 70 多篇，60 余萬字，出版了兩部個人學術論文集：《兩大鄰邦的心靈溝通——中俄文學交流百年回顧》（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0 年出版）和《文化承傳與交流互讀》（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6 年出版）。這些零星瑣碎的成績，在方家耆宿或年富力強的學界新秀看來，可能微不足道，但畢竟是個人心血的結晶，難免「敝帚自珍」，聊以自慰。撫今追昔，感慨萬端，拉拉雜雜陳述如上，也希望能對後生學子起一點鼓舞和激勵作用。

回顧自己涉足中俄文學關係研究近 30 年的歷史，我總結出以下四點體會，供有志於此道的後生學人參考：

其一，要堅持不懈、持之以恆，有甘於寂寞，安於坐冷板凳的精神。中外文學關係研究是新興學科，可資借鑒的前人成果較少，且要求兼通中文和外語，需要披沙揀金，自己去開發研讀原始資料。這就需要時間，需要下笨工夫。期望抄近道，走捷徑，短期見效，早出成果，十分困難。我當年第一次回國投入研究工作，花了四年時間，才寫出第一篇論文，這就大大拖慢了自己晉升職稱的速度。所以，必須有為學術獻身的精神和定力。不受暫時成敗的干擾，心不旁騖，執著專一，才能最終取得成果。

其二，要讀書，也要讀無字書。搞中外文學關係研究的人，肯定要出國，要接觸國外社會和文化語境。那就要把握住機會，廣交學界朋友，尤其是外

國漢學家，同他們保持密切的聯繫，及時瞭解對方最新的學術動態。尤其現在有了互聯網這個便利條件，與遠隔千山萬水的外國友人聯繫，只是電腦鍵盤敲幾秒鐘的時間。我近幾年寫的一些文章，就是利用俄國漢學家朋友提供的最新材料完成的。交友，就要真誠，就要有許多功利目的之外的人與人之間相互暖心的溝通。宋代詩人陸游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今天做學問也是如此。爲什麼外國朋友能對你有求必應？你自己平時就要維護這個關係，不能急來抱佛腳，用時才燒香。與外國漢學界人士保持長期穩定良好的友誼，是從事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一門必不可少的「詩外工夫」。

其三，研究國外漢學，尤其是外國人的中國文學研究，一方面要克服盲目自大，認爲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學全是「門外文談」，不可能有什麼超過中國的真知灼見的偏見；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崇洋媚外，奉外國人意見爲金科玉律的「文化殖民」心理。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國內理論界就有學者提出了文藝理論上的「失語症」的問題。外國人的一些「新術語」「新學說」「新見解」，在某些人看來就是「現代意識」，就要全盤吸納，這是另一種需要克服的傾向。在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的文化自信，要站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去科學地批判地吸收借鑒外國人對中國文學的分析評價。要用我們自己對祖國文學的深刻理解，及時糾正和批駁外國人對中國文學的曲解和誤讀。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世界漢學——文學研究論壇上彰顯一個文化大國的風範，真正贏得國外漢學家對我們的敬重。

其四，要堅持我國歷來奉行的對待外來文化的「洋爲中用」原則。海外漢學本質上屬於外國學，研究國外中國文學研究，是要摸清中國文學流播海外的底數，研究外國人對我們中國文學如何譯介、如何評價，最終爲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服務。所以，我們的立足點是中國，要站在中國需要的立場上，有選擇地觀察和研究外國學術的走向。我們不能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而要積極地引導和扶助外國人對我們的研究。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強大，國際地位的提高，實際上外國人更加關注的也是現代中國的實際情況，對這方面的話題更感興趣。所以，我們做中外文學關係研究的學者，要密切關注外國對中國文學最新動向的研究，及時報導和評論他們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這也是國內學術期刊最願意發表的題目，是有志於此道的青年學子們的成功之路。

（作於 2017 年 10 月 10 日，69 歲生日之際）



# 目 次

## 上 冊

代序：我與中俄文學關係研究

第一編 文化外播 .....	1
引論：俄蘇漢學關注與研究中國民俗文化的傳統.....	3
第一章 阿列克謝耶夫俄譯《聊齋誌異》對中國 民俗文化的介紹與闡釋 .....	15
第一節 中國人的民間信仰與崇拜.....	15
第二節 中國的巫術文化 .....	28
第三節 中國民間婚俗 .....	33
第四節 中國民間生活習俗、自然物崇拜與禁忌 ..	42
第二章 20世紀俄羅斯對中國古代小說的民俗學 接受與闡釋 .....	63
第一節 戈雷金娜對中國古代神話志怪小說的文 化人類學解讀.....	66
第二節 戈雷金娜對傳奇小說情節母題的民俗學 考察 .....	76
第三節 沃斯克列辛斯基論中國話本小說的民間 文學特質 .....	99

第三章	俄譯中國古代豔情小說中的性民俗與性文化 .....	119
第一節	蘇聯時期對中國古代豔情小說的譯介及性文化解讀.....	120
第二節	中國古代性學寶典——《中國色情》 ...	127
下 冊		
第二編	文論吸納 .....	139
第一章	20 世紀俄蘇文論在中國的傳播、影響與本土化 .....	141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文論原著及俄蘇文論在 20 世紀初中國的譯介與傳播 .....	143
第二節	20 世紀前半期俄蘇文論在中國的傳播和本土化 .....	151
第三節	從「游離」到「逆反」與突破：50 年代後俄蘇文論影響中國的軌跡.....	160
第二章	俄蘇文論重大理論命題在中國的吸納、反思與質疑（上）——文學的社會屬性與社會主義文學的創作方法 .....	173
第三章	俄蘇文論重大理論命題在中國的吸納、反思與質疑（下）——文學形象與形象思維、文學典型與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	207
第三編	個案析論 .....	239
第一章	費德林論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經驗與問題 ..	241
第二章	索羅金論中國現代文學在俄羅斯的傳播與研究 .....	255
第三章	20 世紀俄蘇《文心雕龍》研究述略 .....	273
第四章	跨越百年的俄蘇《金瓶梅》研究 .....	293
第五章	《紅樓夢》在俄蘇的傳播與研究 .....	311
後 記	.....	327